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Edited by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002. ix, 260 pp.**

科大衛 (David Faure) 和劉陶陶 (Tao Tao Liu) 主編的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一書由10位學者的研究成果組成，全書所探討的主要問題是，中國人是如何利用城鎮或者鄉村的聯繫來標識他們自己的。西方學者一向有以中世紀的歐洲城市具有與農村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這一歷史情境作為參照來審視傳統中國城鄉關係的傳統。譬如牟復禮 (F. W. Mote) 和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均認為，中國社會不像西方社會那樣存在城鄉之間的尖銳對立而是表現出連續性。然而，關於中國城鄉關係變化具體的歷史脈絡，以往學者大都語焉不詳。有鑒於此，本書編者首先對中國歷史上的城鄉認同作了大致的勾勒：在明清時期，城鄉區別不是個人身份認同的明顯標記；到20世紀早期，伴隨着清末新政，將農村視為落後根源的觀念開始萌動，這種觀念在1920至1930年代得以強化；1949年以後實施的戶籍制度，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它將社會劃分為刻板的階層，並把不同的人群貼上「工人」或「農民」的標籤。

以這種時代劃分理念作為統攝，全書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部份。第一至四章重點討論了明清兩代的城鄉觀。Daria Berg通過考察晚明小說《醒世姻緣傳》，揭示了省城和普通鄉鎮之間在文化生活方面的顯著差異，認為傳統士人嚮往的「田園烏托邦」是根本不存在的，它隨着鄉居者的入仕而名存實亡。儘管在晚明士大夫的眼裡，商業社會侵蝕了傳統的社會等級，逃遁世俗，追求像小說中的「明水村」一樣美麗的自然風光，成為他們找尋「田園烏托邦」的所謂藉口，然而，超出現實以外的鄉村生活理想與「大同世界」同樣遙不可及，結果只能製造出城鄉連續的假象。

趙世瑜從廟會這種既存在於城市又存在於鄉村的活動着眼，探討明清以來人們是如何看待城市與鄉村的。他認為，與西方不同，傳統中國的城鄉之間存在着本質上一致的文化，不同的僅僅是行政區劃上的支配關係，城鄉區分更多地體現在社區界限的意義上。明清時代的城市和鄉村各自都擁有自己的崇祀對象，並通過各自的廟會來整合自己的社區。由此造成的某種程度上的城鄉差異，這實質上是等級關係的體現。而「城隍下鄉」和城市廟會的「鄉村化」則隱喻着鄉村對城市統治關係的溫和示威。

科大衛選取烏青、濮院和南潯三個江南市鎮為案例，試圖將其研究華南的「佛山模式」推廣到江南。他把宗族在江南市鎮確立支配地位（rise of the lineage）的時間追溯到元明之際。至16世紀，隨着市鎮移民的增加，土著宗族和新興宗族之間的矛盾加深，這集中體現在宗祠以「家廟」的形式開始流行和對鎮廟控制權的爭奪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鎮的格局開始確立，士紳階層逐漸取代家族介入市鎮管理，這為地方社會提供了一種與國家打交道的機制。儘管如此，市鎮並沒有足夠的空間製造一個城鄉分離的觀念。在中華帝國晚期，共同的意識模型瀰散在城鎮和農村之中並影響着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行為，城鄉以一種類似的方式與國家發生關係。國家的禮儀只允許地方社會——城鎮和農村——採取國家話語，並通過這種方式，地方權力得到某種自治的空間。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近年來在學術界引起過廣泛關注的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為主要材料，從一個居住在山西省太原縣赤橋村的鄉紳眼中透視清末民初的城鄉關係。沈艾娣發覺，劉大鵬本人生活的空間與其在地圖上看到的空間具有不同的意義：劉所生活的赤橋村和附近村莊共同組成一個鄉，再由數個鄉組成一個縣，縣以上則是府、省、中國乃至世界。這背後隱含着傳統社會中的行政等級對人們空間表達的影響。在這種行政等級制「區域觀念」的左右下，縣級及其以上行政區劃並不代表由具有嚴格邊界的一個一個鄉構成的抽象實體，僅僅象徵着行使具體權力的地方官或者衙門所在的城市，這一認識無疑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理解傳統中國城鄉連續體的格局。20世紀初葉，傳統的城鄉關係行政理念逐漸被一種全新的「地方感」所取代。權力和各級官員在作為省會的太原滙聚，西式建築和制度文化慢慢影響着居住在太原城裡的市民的觀念和生活，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太原周圍的農村缺少變化，鄉民們對時局動盪態度冷漠。

自19世紀下半葉取代蘇州成為長江三角洲的商業中心後，上海逐漸產生出龐大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隊伍，近代城鄉二元分割的圖像亦多以上海作為主要參照。本書的第二部份的五篇論文主要圍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城鄉格局展開。Elisabeth Köll剖析了位於南通鄉下唐家閘村的大生第一紗廠的組織形式。大生紗廠的8000名工人一直被分為涇渭分明的兩類，有百分之五為從南通以外的地方招聘而來的管理人員、工程師和熟練工人，居住在由廠方提供的專門的宿舍大院中。剩下的大多數人為來自附近農村的非熟練女工，廠規廠紀、嚴格的作息時間和勞動分工乃至廠門口的時鐘塔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節奏，可始終沒有割斷他們與鄉土的聯繫。工人們一邊

在廠裡上班，一邊在自己的田裡耕作，兩項工作對於他們的生計同等重要。

雖然民國初年城市的社會政治面貌發生着巨變，但盧漢超提醒我們不能高估這些變化而忽略都市中的「傳統延續」。構成舊上海的不僅僅是那些我們已經習慣閱讀的內容，我們更應該關注小市民和城市貧民群體的生活工作狀況：繁華馬路的背後是擁擠破爛的里弄，高樓大廈遮蓋不了潮濕陰暗的棚戶區。生活在第一個引進現代衛生制度的中國城市，大多數上海市民與抽水馬桶無緣；能夠方便享用各種美食的上海人，早餐卻一直與開水泡飯為伍。從鄉下來上海淘金的無論人力車夫還是乞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逃避鄉間的貧困和落後，這使20世紀上半葉上海的市民日常生活具有相當多的農村色彩。盧漢超在此基礎上發表了對「上海人」（Shanghainese）認同形成的見解。

馬敏關注的問題為晚清時代是否存在一個緣於西方歷史經驗與理論資源的「市民社會」。他利用蘇州商會檔案揭示了蘇州商會的「官督商辦」性質。商會在官府的監護下辦理消防隊和地方治安這樣的城市公益活動，進而將所有其他民間自願組織合為一體，這些活動表現出公共領域的擴張和國家同地方士紳的合作。馬敏認為，晚清地方自治背景下的蘇州商會與傳統會館公所在性質和功能上的剝離是不容輕易忽視的，它至少顯示出城鎮較周圍農村更出色的組織能力，「市民社會」的萌芽更多地是出於城鎮精英自我意識的加強。而清末地方自治按照人口劃分鄉和城鎮，則從法律上和行政上改變了城鎮和農村認同的格局。從這意義上講，清政府不知不覺參與了20世紀初的城鄉轉型過程。

葉凱蒂（Catherine Yeh）在翻閱了繪製於19世紀的各種版本的上海地圖後，發現直至1880年代，華界和租界之間相知甚少。1817年的中文地圖標注了縣衙門和廟宇學宮的位置，1853年的西文地圖只標注了使館和教堂，卻將縣城完全剔出，黃浦江被置於上海最突出的位置。除此而外，中西地圖語言的差異還反映在對城區和農村的標注上。中式地圖更注重的是地圖所蘊含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涵義，有意忽略華界和租界劃分的既成事實，對繪圖技術本身要求不高。按照葉凱蒂的說法，造成上海中西社區分離的主要因素出在中國方面。1880年代以前，中國遊客進入新奇的租界一直被壓制，訪問租界被認為是冒險行爲。1872年，中國人馮卓儒和徐雨蒼利用西式技術繪製出《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把華界和租界放在同一張地圖上。九年之後，《申報》的主辦者英國人Ernest Major以《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為底圖，修訂出版了更符合大眾口味的點石齋版上海地圖。葉凱蒂將完整的上海地圖的最終

繪成稱作「商業主義的勝利」。19世紀上海地圖的整合過程不僅見證了近代上海的城市化，而且體現出地圖背後所凝聚的中西政治文化的緊張感。

劉陶陶以現代小說為素材，將研究的地域擴大到上海以外的其它沿海城市——天津、北京和廣州。她強調，被沿海大都市吸引的不僅有人力車夫和乞丐，也包括以作家為代表的新型知識分子。後者不僅為了求職，也為了追求新文化。隨着傳統的社會流動機制被廢除，新型知識分子在接受了昂貴的西式教育之後發現報效無門，大多遠離故鄉轉而投懷大都市。由於缺乏必要的政治講壇發表見解，嚴格的審查制度也禁止着他們的非份之想，他們不得不借助新聞媒體對時局施加有限的影響。魯迅的小說有嚴重的城鄉分割傾向，茅盾、夏衍和丁玲等通過控訴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紛紛加入到這一行列中；新感覺派小說則以揭示都市文人的世俗生活著稱。老舍和沈從文的小說完全以「故鄉」作為題材，且對城市和農村少有偏見，成為同時代的另類。對於民國時期的作家為何偏愛城市而漠視故鄉，劉陶陶除了將其歸結為現代性情結在起作用外，強調新式文人對自由自在的城市生活更具有精神上的歸屬感的因素也不容忽視。異言之，新知識分子的遷移不僅是地點上的變化，同時也蘊涵着認同上的改變。

1949年以後，嚴格的戶籍制度使城鄉二元格局最終成為現實。而1980年代以來小城鎮的發展，則顯現出傳統城鄉關係的某種復甦。在本書最後一部份，蕭鳳霞（Helen Siu）試圖通過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小欖鎮的經驗告訴我們，傳統的文化遺產有時會對經濟增長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1994年，蕭鳳霞親歷了一次歷史悠久的小欖菊花會。按照原先菊花會的傳統，拜神祭祖活動必不可少。然而，蕭鳳霞在現場並沒有發現人們昇神巡遊的場面，廟宇、宗祠也淡出了人們在歡慶儀式中的記憶，菊花會演變成在國家話語介入下的商貿洽談會。鄉鎮幹部利用人們對家鄉的感情，通過舉辦菊花會來達到重組地方資源的目的，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不是很多人懂得傳統是什麼的時候，人們會巧妙地創造出許多新的傳統。

儘管這部論文集出自眾人之手，不可能涵蓋明清以來城鄉關係的所有問題，但編者有意識地把城鄉關係史的研究置於明清以來大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審視，無疑增添了全書的連貫性，為我們勾畫出一幅含混的城鄉關係序列史的圖景。除此而外，本書大多數作者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將城鄉社區均質化的傾向，也沒有對城鄉空間及其運作機制進行簡單的邏輯替換；更有一些作者從文化認同的角度探討傳統中國城鄉觀念的轉變，這對於打破城市史和鄉村史研究的二元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吳滔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